

一得書

煥 南 著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煥
南
著

一

得

書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一得書 目錄

我們應該有的作風	(一)
簡政不是『減政』	(四)
怎樣做縣長(一)(二)(三)	(五)
不近人情	(十)
介紹一個勵員牲口的例	(一二)
關於減租	(一四)
娶不起老婆	(一六)
壽王齊人	(一八)
『珍重千萬』	(二〇)
續語(一)(二)(三)	(二二)
教友	(二五)
爲過府署報窮	(二六)
國性與理性	(二八)

攝持與蒸養		(二九)
「此心光光地」		(三〇)
口與與書面		(三一)
認得還要解得		(三七)
關於寫字		(三九)

我們應該有的作風

七月三十一日邊參會常駐會第七次常會通過向政府提出關於工作作風的下列建議：

一 計日程功以對拖緩

「急行無好步」，事情沒有考慮周詳，或條件未成熟，不要性急。然必要辦又可以辦的事，就必急起直追，很快辦到。有許多事情不能一下就辦好的，但必須走過第一步而後能有第二步。第一步沒有走，第二步不會到來。

日常事件如例行文件，生活問題，講到就須做事，「一日事一日畢」。小事都積壓，大事定延緩。

我們是「百廢待舉」，一切需要創造，雖然我們已經有了些創造，但還不是每天都有新的成績，還很落在客觀需要和可能的後面。這就是「拖緩」二字在作祟。

二 學習業務培養專才

工作延緩的另一個原因——也是主要原因：缺乏專門人才，遇一件工作，不易提綱

詳盡而又切實有效的辦法。這裏說的專門，是指：每一業務所關的周圍情況的調查研究；每一業務過去的現在的各具體經驗的分析與綜合；關聯於每一業務的政策法令指示決定的研究以及屬於每一業務所應該具備的常識與理論等。由於過去時局的動蕩不定，人員的調動不常，致我們雖曾有過不少經驗，卻沒全把他積累起來；有些同志做政權工作雖久，事情都知道些，却事事都不深入。要進一步來解決問題，制定計劃，就覺得束手。

「苟為不習，終身不得」，不能等待專門人才從外邊來，應該自己培養出專門人才供自己用，並備將來供別處用，只要把作風改變，每一部每一科都能積累經驗，都有研究材料，都久於其職，都有計劃的實行黨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一年半載以後一定大大改觀。

三 注重領導月計有餘

計日稱功，不論大事小事，都有日程，按次做到。日計有餘，是指大的事件，比較基本的事件解決一件，許多工作就隨之改善。這不是短期間能做好的，在一天看，似乎遲緩，在一月看，就大有成績。老話叫：「日計不足，月計有餘」。現我們的工作方式，似乎是一日計有餘，月計不足。這就是還有點事務主義作祟，忙閒不均，應該領導者抓住某些主要工作、多想，打主意。就是躬親事務的時候，也是要從事務中看出問題，來作指導，而不是以解決某件具體事務為滿足。這樣就會月計有餘了。

四 養成法治深入民主

我們生長在沒有民主，沒有法治的國度裏，又不是每個人對民主和法治的制度都有研究，相反，還帶來不少封建專制社會的殘餘。嚮往民主，却不知民主要怎樣做；或對民主很重視，而對於與民主分不開的法治，又隨便得很。「出爾反爾」「自埋自掘」的事，發現也不以為奇，甚至自己就犯。必須注意於法治精神和民主作風的養成，要由上而推行到下，要重視大的，也不忽視小的。

五 保持健康作持久戰

抗戰建國是長期而且艱苦的事，邊區物質又很困難，因此要特別保護幹部健康，尤其是領導幹部的健康。我們政府人員，有的年事已高，有的久經患難。而政府需要我們工作，又不是一年半載而是要十年二十年，個別同志已累病了。所以應提起政府的保健委員的注意，辦法：一是工作時間的調劑，不便疲勞；二是物質待遇上的某種改善。

簡政不是『減政』

『精兵簡政』，是這次參議會裏的有名提案。

把應做的事減去些不做，把可以用的人裁去些不用，這不是我們的要求。我們待做的事正多；目前的人材也非常不夠我們的需要。

然而，僅有的人材，沒有擺在適當的崗位；可以併在一個機構裏的事而分屬幾個機構；一個人可以做的事，而常常用幾個人，『一個和尚担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因為工作制度不夠健全，常常同一機關裏：有的忙的要死，有的閒的難過。……還有最重要的，指揮機關不統一，比如動員：政府動員，軍隊動員，甚至個別機關不經過政府也去動員，致使老百姓不知所以。又如上級主管機關書面指示太多，而和集中到鄉政府，鄉政府人少，文化程度又有限，只好擱着。抗戰負擔，不免繁重，這一點老百姓是懂得的，但也怕的是次數不定，數目不定。……這些現象，確有許多地方存在着。這不僅浪費人力物力，同時還障礙着工作的效率和速度的提高。

老話形容政府好，叫『政簡刑清』；形容不好，叫『政繁賦重』。簡政不是少做事，恰恰那時候是『百廢俱舉』；政繁不是多作事，而是『治絲益棼』。

簡政有很多的道理，不要誤認為只是『減政』。——當然，停止某些不應該做的事，裁去多餘的人，也包括在內。

怎樣做縣長

一

縣長是親民的官，也是真能做事的官。

區長村長雖更接近民衆，然範圍和權力較小；省長廳長總其大成雖有餘，深入實際常不足。所以自來「循吏」「能吏」，都是縣長；著名的有創制成績的政治家，大都是「起家州縣」；後來的成就，由做州縣時累積而來。所以稱職的縣長，做省長廳長也會稱職；而做省長廳長過得去的人，不一定能做得了縣長。

政治最是實際的，不「深知稼穡之艱難」，不「請問下民」，就不會有適合民情得對人民積極擁護的建設；而有聰明才力的人，不躬親實際，坐在轎洞裏想，絕不會造成出而合轍的車。縣長是躬親實際的戰鬥員，又是領導實際的指揮員，許多實際事件都在他面前，要求他去做，而許多實際事件的做法——不都是上級預先指示，或可以臨時去請示的——逼得他去想。這樣的想，是有根據的，不是憑空想出的辦法，馬上就要在實際上考驗，不容你「固執」。所以縣長不僅是行政成績的實施者，且應是各種具體政治規律的創造者。退一步講，有些縣長「想」的能力，不及止級的人員強，但如果沒有縣

「了解情況」的反映，沒有縣長初步的想及想出的辦法，上級領導人員絕不會想出來。上級領導人員固應該自己動手收集材料和經驗，自己開頭想辦法，但主要還是靠經過縣長。

邊區是新民主主義即三民主義首先實施的地區，邊區縣長多由羣衆中來，從羣衆鬥爭中生長，富於實際經驗。然而有這種情形：許多具體工作，上面苦于不了解情況，不能製定自認爲滿意的方案，下面又常以上令不得不遵，心裏却不以爲恰當。甚至下面甚麼事都請示，却不提辦法或根本沒有想辦法，似乎上面是萬能，上面有時也好像是萬能，却不知道其十足官腔，難題很遠。這不是縣長之過，而是我們的作風有缺點。

應該把縣長看做是施政的重要環子，加重他的職權和責任，精神上鼓勵他，能力上幫助他；縣長也要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力求長進。一切上面束縛縣長過甚，不尊重縣長意見，不燒誘縣長的創作；以及縣長自認爲：「我只執行別人指定我做的事情」的作風，都是要不得的。

二

沒有知識，做不了縣長。

縣長要的知識，不是空洞的教條和單純的經驗，而是要真正的理論與實踐的合一。比如說罷：

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論持久戰、論新階段、中共中央歷次宣言、邊區的施

國綱領、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國民黨的抗戰建國綱領、最近學習的二十二個文件，還有一般政治常識等，這些大道理，如果不了解及把握得住，那末，遇到複雜和困難事件或困難時期，不免動搖或打折扣。抗戰動員如擴兵優抗徵糧等任務來，說不出道理，只說這是上令，誰不聽就細綁誰。對於某些違反原則的事件，看不見或裝做看不見，任其滋長。一個螞蟥穴，可以潰堤，政治上一點漏洞，可以引導革命走到失敗。

然而並不是記熟書本上文件上這些道理就夠的。書本上的道理，不就是縣裏某些具體工作。民衆的情緒，環境的狀況，千差萬別；各地各事的歷史發展，民衆的經驗，很不一樣。如果不知道現況，累積並分析過去的經驗，徒然讀過些書本子和文件，那臨事時是茫然，不知所措；若自以爲是地做去，必然要被釘子碰回。所以經驗的知識和理論的知識，一樣重要。

理論和實際，並不是一件東西，拿最後近事實的上級文件說罷，也只能說出一些具體的處理及可行的辦法，並不能指出某縣某處某事應怎麼辦。比如三三制的人員配備與民生工作，懂得了，而應該團結什麼人，某件事某會議應採甚麼樣的態度，就在於自己的運用。動員工作要軍民兩便，負擔問題，要公平合理，懂得了，而怎樣使動員有條不紊，工作做了而民不勞，怎樣消弭要私情眼目標等不合理現象，在於自己的做法。這就是做理論與實際合一，實際得到了理論的指導，不是盲目的幹；理論化爲了具體的實際，不是生搬硬搬。

我們縣長不少出死入生，創造邊區，富有實際經驗，然而常失之狹隘，看不很遠。不打仗就覺得沒事做；對細密工作不耐煩；生活較安就流於消極，這是不學的原故。破

便可以無學，建設非學不行，現大多數知道學了，每天兩小時，抱着書本啃，啃不動，有的又欠而生厭。原因是學了不知道用。

再急吧！知識這東西，尤其是要學成政治家那樣的認識，是大難事，是要長久而由弱漸堆積的。應該：

讀：每天不斷，不在多讀，而在讀懂。

想：讀了的，聯想到做過或正在做的；做之時，又聯想到所讀過的。看有無可聯系，再另想出新東西。

討論：『一人不及二人見』，不論讀的做的，或是或非，都要耐心討論。向人學習，向我強的人學習——當面請教，通信討論。總之不可自以爲是。

檢查：選件檢查，定期檢查，檢查出的教訓要穩穩記住，應用於以後。上次檢查以疑難的，也許下次又發見其不好。

個人的遠大前程，新中國政治的建設，在縣長們自己身上，在縣長們自身努力的歷歷上。

三

了解實際，改造實際。

區鄉是最了解實際的，然區鄉幹部，有的缺乏推想能力，有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省級（如邊區政府）政府是領導改造實際的，然常常懂得很多道理，却少躬親實際。

的經驗。只有縣政府——縣長，他是實際做的，時刻要深入區鄉，又是時刻在想改造實際的，因為區鄉幹部要求他想辦法。——他能夠想辦法，因為他躬親實際；他想的辦法不會落空，因為馬上就要在實際中考驗。

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工作，需要創造；縣長是創造的重要一環。

邊區縣長都不是書呆子，少有一「教條」作祟；又都來自民間，從參加革命到做縣長，積累的經驗非常多。他們很能創造。舉個例子：習仲勳同志（專員兼新正縣長）在小學教員聯席會上發現知識份子的可寶貴，於是規定鄉長應怎樣禮遇小學教師，替小學教師解決困難，同時請小學教師幫助鄉政，小學教師應兼文委主任或委員等。黃靜波同志在牲口動員上想出分隊輪差的辦法，軍民兩便。都是好創作，推進了工作，適合乎民情。然而為什麼這樣的創作還不很多？不是下級不能創作，而是上級沒有提倡，沒有收集他們好的例子加以贊揚，加以改進，加以推行；或者忽視他們的意見，不去引伸之助長之，反而在權限上束縛他，使他們謹小慎微，不敢自動。

應該：養成縣長善於在複雜環境中獨立決定工作辦法，不怕負責任；而不要變成命令上寫了的就做，沒寫的就不要做的呆人。縣長提出新的和不同的意見要慎重考慮，或即採用，或使試辦，而不可因其不同或說得不充分就任意抹殺。當然，不是說縣長可以違反上級指示，或不要請示。

至於縣長，負一縣一切工作的責，也即是負新政權建設的責。要把自己看得重，定要了解黨的政策，施政綱領，政府法令，上級指示，把它運用到具體的事實中去；要聽取老百姓的呼聲，研究區鄉幹部的意見，綜合起來想一想；要經常和上級領導者商討，

（自以爲是，或者瞞上不瞞下，都要不得）。這樣，好的辦法就會出來。好的辦法在實際工作得到證實，就變成了規律。

我們要有這樣有能力的前進的縣長：我們要做成也一定能做成這樣的縣長。

不近人情

一位同志從鎮原來信：

「……最近有兩個案子的判決，都是在尊重風俗習慣的藉口下進行的。我以為十分不妥當。」

一、五鄉人民譴得周，十三年前把寡弟媳賣給姓段的，當時帶去一個三歲的女孩，現女孩十六歲了，去年譴得周又把這個女孩賣了（這裏女人價很大，好的可以賣上一萬元法幣），因女孩本人和段家堅決反對（因女孩一直在段家養着）婚約未能成立。今年譴得周又以承嗣的名義，要把女孩接回，女孩不肯，誰起訴，法庭說是尊重習慣，判令女孩限期回譴家，由譴家給段家三石麥，四疋布。女孩和母親不願，逃往友區，法庭硬要執行判決，又把她倆追回。

查現行法令，夫婦離異，兒女有選擇從父從母的自由，難道進步的邊區，反而沒有這種人權嗎？至說「繼承」，這裏並沒有女子承祧的習慣。譴得周是個鴉片鬼，想在女孩身上找鴉片，所謂三石麥四匹布，無疑要靠女孩身子去換，譴本人是早就沒得吃的。

二 五鄉人民張青英和焦生林是鄰居，焦住在溝內，張住在溝外，焦家的大車出，必經過張家的路，已經走了多年了。最近張家說方向不利，把路斷了。焦家向區上告狀，區上以這是習慣，說焦家告的沒有理。

風俗習慣，應該遷就些，但究應遷就到甚麼程度？」

「入境問禁，入國問俗」，判斷案子，應該知道當地民情習俗，法律也有尊重習俗的規定。不過所謂習俗，一是本有道理，合乎常理當時民衆的要求；一是民智未啟，迷信太深，不能不暫時遷就。雖然如此，仍應該盡可能使民衆前進，而不應向落後投降。來信舉的兩個例，如果屬實，恐怕不是遷就習慣，而有點反乎習慣。嫁女要錢，猶可說：父母養女費了力，嫁做別家人，要點報酬。若叔父賣姪女，賣他從沒有養育過的姪女，旁人一定抱不平，因為太不近人情了。

人行路，「人各有半邊」，南方村落緊密，住戶出入，有的不僅經過他人門外的路，而且要經過他人的屋內。習慣是不許禁止的，因為若禁止，豈不把人家窒死？我想北方也必不異樣。就是異樣，也應勸導人民「便人便己」，不能藉口「遷就迷信」、「尊重地權」，而置人家利益於不顧。因為不近人情。

法律是本乎人情的。合乎人情的習慣，即是法，應尊重；且可採入到正規的法上來。不大合乎人情而以某些原因，未能即除去的習慣，應該用教育和政權的力量，使之漸變；至於一般人已甚不以爲然的習慣，那就應用斷然手段，把牠割掉。

司法的人，要懂情理。要懂得不近情之理和不合理之情。然後斷案就會合法，得到人民的擁護。

介紹一個動員牲口的例

清澗縣府來信說：『我們的運輸隊是這樣組織的，把近城幾個區及義務勞動比較少（抗工屬較少）的幾個區裏的趕腳的和有強壯牲口的人編成隊。十個一隊，每隊選一隊長，免除他們其他勞役，只來縣城應差。現在全縣共有三十三隊，每隊應差一天，三天輪一回。運輸的路程只兩站，上至綏德，下至延川，遠則不負責。』

每天有一隊到縣府應差，有差事就應走，沒有差事第二天就回去，伙食草料都歸自理。不一定每天都有差事，十個牲口空來回，用不着。所以有些運輸隊只來一隊長，帶些錢，有差事就僱牲口，或只帶三四個牲口，不夠，就加僱。每次應差，都由縣府打給一證明條子，回去和家算賬（即十家平均担負）。如那天要的差事超過十個，那由縣府另設法，不歸該運輸隊管。動員牲口，每站公家給洋六元，其餘歸應差的十家分擔。

運輸隊每次應差，都給有應差條子，到了別的地區，遇有差事，不能再叫應差。

怕運輸隊到日期不到，因此要每個運輸隊在本街尋個店鋪，負責去叫他們，或即由該店鋪代為僱支。

怕各運輸隊忘掉日子，縣府印有輪差的日子（按舊曆）表，要他們隊長貼在岸上

上列辦法的好處：（一）應差有一定，老百姓不要天天担心，正在準備做甚麼事情，忽被叫去，甚至妨誤莊稼。同時也不致負担不均，單是麻煩近城的老百姓。（二）區鄉政府也減少麻煩，不會天天有要牲口的。（三）軍差不致有遲緩隔誤。

x

x

x

動員牲口，應付軍差，是必要的。也是人民最感麻煩的。我們今天不是空喊「減少動員」或「動員統一」所能有效。而是要想辦法，想公私兩便的辦法。辦法是有的，在羣衆的習慣中，在下級政府的創造中。比如清潤的動員牲口辦法，說出來很不平常，然而老百姓已受益不淺。

關於這事，各縣應該根據具體情況想辦法，可以學清潤的樣，當然也不必呆板的學。

關於減租

「慶陽全縣土地約有百分之九十屬於地主。一九四〇年隴東分區臨時參議會及慶陽縣臨時政府委員會，頒佈了三七減租辦法（即原租一斗減三升），但這一辦法並未普遍實行。原因是地主勢力頗大，農民沒有堅持減租的勇氣，只有少數的農民減了。」

縣政綱領頒佈以後，地主一方面更看重了自己的地權，重新測量地畝，另一方面有部分地主用收回土地辦法，威脅農民按原租交納。新的剝削方式也隨之產生，夥種地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夥種地：地主只出土地和種籽（每畝出種籽一升），而農民要出耕牛、農具、肥料、和勞動力。等到收穫，地主坐得一半。農民形式上雖有了地權，實際上除去耕牛農具肥料勞動力等消耗外，落到手裏的就沒有甚麼了。

「……佃戶怕地主收回土地，只好十成交租。他們說：『減租固然很好，但使得我們沒有地種了』。甚至有些地主私向佃戶增租，以圖奪取耕地，所謂『增租奪佃』的事也常常有。」

『所以在綏德縣，政府雖已頒佈了減租的法令，但實際上並未發生多大的效果。因此發生明減暗不減的現象。根據綏德縣沙灘坪第二鄉第二行政村的統計，在全村十四個租戶中，按照政府規定六成交租的（按綏德分區減租條例，豐年照原租減百分之二十五，平年減百分之四十），只有李國良一家，其餘十三家都照原租額交租。在全村二十六戶夥種者中，只有一戶是按四六分的，其餘都是對半分（按條例，夥種的收穫量，除種籽外地主得四成，佃戶得六成），又綏德堡湖峪第三鄉第三行政村的統計：全村十個租戶中，按全額交租的五戶，按六成交租的兩戶，按少於六成交租的三戶；在十六戶夥種者中，對半分者十四戶，四六分者不過兩戶。』

『一般的說：在經過土地革命的地區，在農民較有組織的地區，減租的比例是大些的；在未經過土地革命的地區，在農民沒有自己組織的地區，大部份是未執行政府減租條例的。因此，減租的程度，在綏德縣是不平衡的。』

『……目前二鄉（綏德新店區二鄉）夥種之風蒸蒸日上。老百姓說，租種地明後年恐怕會絕跡了。……』

『原因大概有下列三種：一，怕分土地，藉以「裝窮」，這是聰明地主想出的保護色。二，夥種地對地主保險，不論年成好壞，總可獲得全收穫物一半。三，夥種地不像租種地一樣要受法律（如減租法令）或習慣（租地有年限）的限制。』

『夥種地的地主剝削，比租種地多，有的多到一倍以上。夥種地地主要出生產工具，但也有不出或只出一半的。夥種地多少要降低農民生產情緒，一個農民說：「過去十垧租地，我可以多鋤一次，多打幾頓糧食，兩個掌櫃要我夥種，我就少鋤一次，抽空手打短工，賺他幾個」。少鋤的理由很明顯，誰曉得明年這地咱種不種呢？』

人心不足：農民見減了租，就想全部不交；地主見要交租，又想全部不減。『扶得東來西又倒』，目下欠租的雖還有，但主要嚴重現象在地主不願減租，或採用新剝削方式——夥種。

地主——農民，是剝削與被剝削兩個階級，這兩個階級的調盤，不只決定於站於兩個階級之上的政府法令，還要決定於兩個階級力量的對比。地主倚靠土地的所有權及其操縱的知識，容易使農民不敢不就他範；農民一無所有，必須有自己的組織，靠人多，靠齊心，才可能和地主競爭。這個道理，在大革命時的農民協會證明了的——，當農民協會存在時，二五減租行通了，大革命失敗後，農民協會沒有了，國民政府雖曾嚴令二五減租，一對勁用沒有。在綏德分區考查團的報告上也證明了——「農民較有自己組織的地區，減租的比例就大些；農民沒有自己組織的地區，減租條例大部份沒執行」。

所以我們必須幫助農民建立自己的組織。使他們自己有能力提出自己的要求，保護自己應得的權利。其次，政府的土地租佃條例急須正式頒佈，要加上關於耕種的規定，如籽種必須地主出耕牛耕具，借吃糧等，僅僅借籽，不能算耕種。以及籽種年限及收穫物分配等。

減租交租的辦法，須嚴格執行，不是嚴在一方面，而要嚴在兩方面。不妨害地主的利益，也必須顧到農民應得的利益，否則農民生產熱忱不會提高，抗抗無力，整個民族將受到損害。地主們在這方面大方一點，不鬼鬼祟祟，而能得到地方繁榮，抗戰勝利，這也是很合算的。

娶不起老婆

志丹來信：

現在物價漲了，賣女子的價錢也漲了。過去志丹娶老婆，費錢是幾十元至一二百元。現在至少要一千元以上。窮漢人倒霉了。講自由是那辦不到，誰有錢誰就有老婆，沒錢是眼乾着急。舉幾個例子：志丹六區五鄉宗家圪堵，宗維珠娶了定邊縣黃砭區趙家婆家一個寡婦，廿餘歲，去法幣洋三千元；又該鄉劉家坪劉景仁賣女子一個，得法幣一千三百元；六區一鄉背家莊，康紀章訂了華池縣蘭家澗的一個七歲女孩，去法幣洋七百元。這些例子到處都有。賣女子的事，是家長幹的，女子倒不一定情願。

延安市來信：常駐會上有人提出：延市婆親有幾上萬元的，表面上是送禮，實際是買賣；辦不起禮物，女家不肯發親。這就難爲了窮人了。

又信：『法律規定女子有財產權；土地革命地區，女子分了土地，然而女子出嫁，一般很少帶財產去的。』

某老先生說：『人家說我：「你老有兩個沒出閨的女兒，怎麼說窮」？我是讀書人，怎麼能賣親生的兒女？』

這是件大事，關係於婚姻，關係於貧富，關係於人權；我們禁止買賣婚的條例，在大多數人中間還沒有行得通。

應該注意這件事。

大概原因：

(一)重男輕女的習慣，養女嬰不如養男嬰那樣注意，致女嬰死亡率高於男嬰，因而形成男多於女的現象。

(二)買賣女子，除少數『時禮之家』外，都看做常事，把女子看財物，不以爲不道德。

(三)早婚習慣，男子不知爲甚麼要娶老婆，女子不知爲甚麼要嫁丈夫，尤其女子方面，更說不上自主。

(四)婦女工作沒有深入，有時因爲太爲剛強而自由，受到農村的拒絕，因而壞習慣不僅不逐漸減少，反而加甚。

應該注意這幾件事：

政府法令——禁止買賣婚，尊重女子的人權財權，應該不放鬆，就是沒有全部實現，也是人民不對，而不是說法律可以讓步，可以遷就落後。

另一方面，要建立新道德觀，養女孩不注意，把子女出賣是忍心的事。過去賣女子是因爲窮（富人很少賣女的），猶可說也，現在一般是有土地有飯吃了，爲甚還把自己的女兒不當人？賣女子要受到社會的責備。——當然也要受法律的制裁。婦女工作要真正深入，不是只鬧婚姻自由，而是要怎樣提高女子教育，培養出本地得羣衆信仰的婦女運動幹部。女子社會地位的提髙，跟女子文化的提髙是分不開的。

我對這問題沒有成熟的意見，只提出來請大家注意。

壽王善人

以前，我不熟悉王維勤同志，前年和他同住了一時期，深深爲他可敬的品質所感動。

一個管理班長賤價強買了老百姓幾棵樹，他除把該管理班長押起及嚴詞斥責連負責人外，並爲此事當晚睡不着，一清早就跑到老百姓家看看樹兜的大小，詳問老百姓的心意，並向他道歉。這個老百姓家隔旅部約有十里之遠。

部隊駐久了，要生產，和老百姓接觸多，他生怕有使老百姓不安的事，每有所聞，

立即追究。「我們是共產黨的軍隊，和羣衆脫離，還配叫共產黨嗎？」「我是老共產黨員，兵帶得不好，對得起黨嗎？」常常拿這話告誡部下，並以自責。

一個副官長要孩子氣，違反了一點命令，王維舟同志大罵，把他撤職了，但又撫慰備至，好像慈母打了孩子而又痛惜的一樣。

維舟同志自奉儉薄，吃得不好，穿得更壞。而他又時刻關心部隊戰士們的生活。

求知慾最旺。每天兩小時學習，他是沒有間斷過，時間也總是比兩小時多，每晨點燈看書至少有一小時，夜夜如此。

維舟同志的率真、坦白、從善如流；時刻爲羣衆利益着想；除革命的、羣衆的、黨的利益而外，不知道有個人；他的好學是爲着更能把革命的事做好些。

他是羣衆中產生的領袖，因此，很喜歡和羣衆接近。老百姓有事，總是找王旅長，上自紳士下至窮無所歸的人，路上碰着就說，他總想办法替他們解決，老百姓是從自己的經驗中，才上他這個「善人」的稱號。武人而有「善人」之稱，是不容易的。

我們應該向王維舟同志學習。

要知道，今天祝賀維舟同志的壽最可貴的，是除我們同志及一般社會人士外，還有千百萬連隊戰鬥員伙馬伕以及城市與鄉村中無數的平民大衆。

「珍重千萬」

一天，到兩處地方講話：一是爲辭而去的，一是爲去而辭的——不是有非辭不可的辭，而因爲要去就免不了辭。其辭了四個鐘頭，又走了些路；回來，疲倦了。疲倦是尋常事，過一回子就好了。然而這次疲倦過程中的一刹那，有頗異於尋常的現象。——也許是前些日子我的兒子發家信，發就是信信要經過我這裏，信上說：「父親經常有病，我看，是一天天的老了」。老而且病，下文就自然要接着一個「不言自別」的字樣。

今天看某同志的筆記，中有：當紅軍長征北上的時候，有一般上的議論說：共產黨雖然失敗了，但並未消滅，因爲他們的某些中堅幹部還存在，尚可死灰復燃。共產黨的幹部是不會投降的。因而就有十萬二十萬元購……成爲當時政策之一。這就不能不使人痛恨殺落階級爲延緩其沒落，採取非人的消滅或摧殘革命優秀份子的肉體的政策，使得現在有老幹部存在不多，新幹部的提拔與鍛鍊來不及的現象。

「應當要求各黨黨的領導機關，極端負責地保存幹部，尤其是在秘密黨裏」。……「應當把這些令人痛心的經驗，當作嚴重的警告，當作今後工作的教訓」。（李永特指出）。這是黨爲革命奮鬥的主要條件之一，要打仗就得有武器在手。『爲了黨與革命的

利益而犧牲自己，保護自己的生命與健康」（劉少奇），這是每個黨員的義務之一。爲了革命不惜犧牲，但要戰勝敵人，定要盡可能先有自己存在。

手邊恰有一本魯迅論文選集，翻開看：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想完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爲先前所沒有的。……」

不免又有點惘然。

於是又來個「一二三四」：

（一）毛澤東同志說：「聯共十八次代表大會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報告中間說：『老幹部通常總是不多，少於需要之數，而且他們已因宇宙自然法則關係而開始局部的衰老亡故』。他在這裏講了幹部狀況，又講了自然科學。我們黨如果沒有廣大的新幹部同老幹部一致合作，我們的事業就會中斷，所以一切老幹部應該以極大的熱忱歡迎新幹部，關心新幹部。」即是說要大批的培養新幹部，每個同志都有「帶徒弟」的責任。

（二）把生命「提供」給黨，不是不把生命自私就完事，而是要使生命能產生出更多的革命成果。不論年青年老的黨員，都應珍重自己的身體；飲食、起居、男女、嗜好，要有節制；要有適宜於身體的各種鍛鍊。生命強，負得重，生命久，做得多。

（三）忽視自己身體的保重，不僅是對黨不負責，而且是對於他人的讓步，對仇人讓步是可能容許的嗎？——當然，這裏是得不出逃避工作的結論。

（四）保證身體健康的物質條件，現在是有限的，主要依靠自己精神的振奮與愉快。

——我們應該振奮，我們並沒甚麼不愉快——。我們決心鬥下去，也有決心活下來。

「珍重千萬」——「千萬珍重」——

續語

續絕亭先生善談，有很多好的話，錄幾則如下：

一

「庖丁解牛……」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也，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視爲止，行爲遲，勦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

田忌和齊王賽馬，屢負。孫臏告他說：「臣能令君必勝！」「齊之良馬，聚於王廐，而君欲與次第角勝，難矣！夫三棚有上中下之別；設以君之下馬，當彼上馬，而取君之上馬，當彼中馬，君之中馬，當彼下馬，雖一敗，必有二勝。」田忌照他的話，果然勝了。

物的毀壞，由於有間；世界上沒有永不毀壞的物，即是沒有無間的物。『有間』即可以『入』。要在審出他的『有間』，而又具備着入間的『無厚』。庖丁『目無全牛』，我們則目無全敵。封鎖溝，封鎖壩，砲堡，鐵壁合圍，固然不過是線上的點；而敵軍的部署上，敵偽的關係上，敵和民衆和士兵的矛盾上，處處都開着方便之門。間隙大，入的可以大點（較大兵團）；間隙小，入的不妨小點（化整爲零）。到處『游刃有餘』，而敵人不能覺得；似乎『動刀甚微』，然而忽然『如土委地』。

游的目的在於擊，避免敵人的優勢，找尋或製造敵人的弱點，以便下手。這要善於游且要敵人不知其游，才能做到。雖然如此，擊的時可以占些便宜，然決不會有僅僅『縛雞之力』就可以『搏虎』的奇事，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是指整個戰爭說的。

若夫戰役，則總不外以較優的兵力，消滅敵人較弱的一部。一部消滅了，其它部也許聞風而潰；即使不潰，今天消滅其一部，明天又消滅其一部，逐漸改我優敵劣的形勢。所謂『聚小勝爲大勝』，也就是『以我上驕，當彼中驕，以我中驕，當彼下驕』的辦法。

續先生說：『吾於庖丁解牛，孫臏賽馬，得游擊戰焉』。

二

社會由舊進到新，是逐漸的，不是陡然的；是揚棄的，不是切斷的。社會的新舊因時間而不同，表現在人身上，就是青年與老年的意識和行動的隔閡。特別像這樣新舊更

變的時候。老年人生長於比較舊的時代，銳氣已過，先入爲主，對於新的看不順眼；青年人激於時變，急進，覺得老人一切不行。

然而事實並不這樣，青年人的朝氣，是社會最寶貴的東西，沒有他，不能進前；老年人的經驗，持重，也是可寶貴的東西，沒有他，社會沒有基礎，同樣不能前進。爲要使社會健全的前進，應該看得遠，看得深，老年要愛護青年，把好的東西傳給他們，不是自以爲是而是一代要賽過一代。青年人要尊重老年，學習老年的好的學識和經驗，以改變自己的薄弱。在新民主主義三三制中，尤要這樣。那些盛氣凌人（青年有勢，青年盛氣；老年有勢，老年盛氣），或內存鄙視外示謙虛的現象，都是要不得的。

我以爲統一戰線的內容裏，應添一個老年與青年的統一戰綫。

III

續先生詩：

每欲自殺不自殺，

也想殺人差殺人，

荊軻計左屈原小，

魯迅文章百萬兵。

魯迅先生說過：『我也常想到自殺，也常想殺人，然而都不實行』。續先生是自殺的，那時對時局痛恨已極，對中國前途漆黑一團，想不出辦法，只好自殺在中山陵前

●想以自己的血，刺激那自命爲中山繼承者的天良。然而到現在，續先生不顧死了，且很想自殺過的衰弱身體，久活下去。

我說：你如當時是左手用刀（據說自殺要用左手，用右手常常殺不死）●也許死了，效力如何？也許被反革命利用做幌子，假惺惺哭掉一回，反正你自己不能說話了。續說：那時我正沈溺佛學。如果懂得了前進的革命理論，就不會這樣。

敵友

二件大事：世界各國如英美印度加拿大……等，已經或正在解除對於共產黨的禁

令。
據說禁共產黨，是共產黨要改變資本主義爲社會主義，富翁們怕荷包不穩當，於是
不惜用盡一切殘酷卑鄙的方法來反對共產黨。然而事實呢，搶他們荷包的不是共產黨，
而是另外一種人——法西斯匪徒。他不僅搶荷包，而且連安頓荷包的國土政權乃至連你
的生命都要搶去。而最有力最忠實來保衛國土、保衛自由，即保衛不論窮人富人——整
個民族的命根子的，却恰恰是共產黨。於是懂得了：非各階級各黨派緊鑼密鼓團結，不能生
存，非互讓互助，實行民主，不能鞏固團結。於是戰時新趨局面展開了，戰後新的前途
也確定了：『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不擴張領土，不干涉別國內政，各國人民有選
擇政治制度的自由，不讓法西斯再有抬頭的可能』（中共宣言）●『任何接受財政救濟

濟援助之國家，不應因此稍損其獨立。……吾人對於長期之失業，貧富之懸殊以及多數人民之缺乏機會，未能再事容忍」（艾登演說）。

於是共產黨領袖成爲歷史上不良之物，不得不自動解除。

誰敢誰敢，本是很明白的，然而要認清却非常難。長期的很多的血的教訓，具體事實的證明，才能清楚認識或仍然認識不很清楚。如果歐美各國早就容許共產黨人參政，接受共產黨統帥戰線與集體安全的建議，決不會有此世界大禍。必待法蘭西波蘭……等國因反共遭到滅亡，其餘各國都遭到深重危機的時候，才來解除共產黨禁令，這不能不感到人類的太不聰明。然而希特勒勒令於「危急存亡之秋」找到救星，毅然解除共產黨禁令，又不能不感到歐美人畢竟比我們落後國度的人們聰明。

爲邊府牆報寫

懂得中央指定的二十二個文件，不是易事，把二十二個文件上的東西成爲己有，更不是易事。

二十二個文件，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体事實互相結合的方法，是中國共產黨二十年艱苦奮鬥經驗的結晶。這是一柄武器。過去我們知道這柄武器，可是投拿到或投完空拿到。現在我們拿到了，就是這些文件。但是中央決定和毛澤東同志的報告，要變成每個同志腦子裏手腕上的而且能夠運用的東西，不是易事。學武術的，習

也。欲訪名師，名師訪到了，須得下三年苦練工夫，不然，不合到手。

『如東以爲討論了一塊，就解決了問題』，或者以不過如此，不值得費力精讀，那不是笨拙就是不想學到本事。

就文件討論文件，不好，離開文件討論文件，更不好，首先要逐件讀、逐節讀、逐句讀，逐字讀，了解全篇各節各字句的含義爲何？爲什麼要這樣寫，是根據過去的什麼事實，又針對着現在一些什麼事實？又爲何這種方法是正確的，是比前好的？於是乎就有「疑一實一實」了，有議論可發了；也就可以反省到自己，檢討到別人到本部門而不是泛泛地反省與檢討了。這樣，逐漸可以把武器由文件上移到自已手裏。

研究文件要細心，否則字裏行間的東西就看不見，甚至字句還沒弄清楚。要多想，經驗較少的同志，更要多想，想出來，就好質問，從質問裏得到些東西。要記，要一動，就寫在紙上，不讓他失掉，作爲心得。

要切戒天意的閱讀，空泛的討論。議論發一大堆，反省總是一套（當然比啞口無言，「期期保身」的要好），費力頗多，而所謂思想革命的武器，仍然在文件上，不會跑到自己的手裏來。

我願同志們有許多問題的提出，我願在這期間題報作爲我們研究的園地。

感性與理性

王國維先生說：

『吾人之知識，分爲兩種：一直觀的知識，一概念的知識。直觀的知識，自吾人之感性及悟性得之；而概念之知識，則由理性得之。直觀的知識，人與動物共之；概念的知識，則惟人類所獨有；人類既享有動物所不能有之利益，亦能陷於動物所不能有之錯誤。夫動物所知者個物耳，就個物之觀念，但有全偏明昧之別，而無正誤之別。人則以有概念故，……爲不能直觀之概念，故種種錯誤，得附此而生也』。

王氏以概念（理性知識）是由各個具體的觀念中抽象而得，『抽象之力，進行不已，所謂物者非實物，概念而已』，『物之概念，離實物不遠，其生誤解也不多；至普遍之概念，其初固亦自實物描象而得，用之既久，忘其所自出』而謬誤亦多。比如我國的『理』字，說文解字：『理，治玉也，從玉，里聲』。段玉裁註：『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爲璞，是理爲剖析也』。由此類推，凡種種分析作用，皆得謂之理。本是個動詞，沿用久，變成名詞。至宋儒給理字以特別意義，彷彿理是離開萬物而存在的，是『萬物之

「，是『行而上之道』。理既是不可直觀之物，『種種謬誤，遂附此而生』。

王氏的見解，很明確。毛澤東同志說：『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向客觀實際得到了證明的理論』。如果只記着前人所抽象出來的知識，不去實證，『機械地由一種條件搬到另一種條件去』；或者拿前人所抽象的做依據而重抽象一下，離題越遠，錯誤越多。這樣的理論，如只放在案頭上擺樣，雖然『比屎還沒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於人無干。若拿了去對付革命，那就爲害匪淺，『容易把革命弄壞』。從概念出發，抹殺感性，自以爲是，不懂人情，可以做出絕不近人情的事，可以做出缺乏書本上知識的人所絕不會犯的錯誤。

犯某些嚴重錯誤的人，如要說他居心不好，那是冤枉，他是直心腸地想做好；說他沒有『知識』（加括弧的知識），更是冤枉，書讀了好幾櫃子，然而做出的結果，出人意表的壞。這就是他心裏離開實際太遠的『道理』在作祟，理性上的錯，排斥了感性上的不錯。

所以理性知識，必須融解到實際中去，指導實際又在實際中得到考驗和發展，才算有用。

拂拭與蒸煮

『如果它與羣衆隔絕，如果它用官僚主義的灰塵掩蓋着自己，那麼，它就會陷於滅』

亡」(聯共黨史結束語)。

『灰塵掩蓋着自己』——人看我模糊，我看人也模糊。小資產階級的尾巴，使得我們思想上、組織上，常常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與事業，隔着一層朦朧的灰塵，特別是「小生產者知識份子的成份」。

從前有個和尚說過四句：

『身似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不使染塵埃！』

另外一個道行更高的和尚說：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染塵埃？』

我們隔『本來無一物』的境界遠遠，而是本來就帶有不少塵埃，或這時時沾染着塵埃。比如『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獨立主義』，『風頭主義』，『自高自大』，『風無組織』，『自由主義』，『粗枝大葉』，『以爲是』……等等，都是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與事業不相容的，是阻礙這組織與事業的『障礙』。自然，主觀地保存這『障礙』的，不會加入共產黨，但加入黨、受過黨的教育，不一定就把這『障礙』完全

撒銷了，多少總還有點距離。有的只是微塵，有的則這是「大風揚沙，伸手不見五指」。有同志（連我自己也在內）說：我主觀上沒有甚麼，我的動機是好的，這無異說我的心靈上沒有灰塵，真的沒有灰塵嗎？那就不應該做出「隔著灰塵」的事。要知道灰塵是有的，祇自己不覺得罷了，自己不覺得，懶去拂拭，將使灰塵越積越厚。自己不承認有灰塵，也就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表現——灰塵，這是很危險的。壁鏡掛久了，不大明亮，以為原來如此，偶把鷄毛帚子一觸，發現一道光明，你就知道不去拂拭是誤事的。

不能夠主觀地把自己看做：「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而應該自己責備嚴：「時時勤拂拭，不使染塵埃」。

積範亭先生詩

學習從來貴有恒，
理論原是講明證。
革除積習須持久，
緊火煮完慢火蒸。

革命二十二文件，
黨內黨外齊學習。
今日先用緊火煮，
今後常須慢火蒸。（註）

改造自己，把自己完全變個樣，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不是件易事，要工夫深，火候到，「五個月」^(註)，是鑒火煮；「長時期的思想上教育與行動上實踐」(四三決定)是慢火蒸。煮的時候要受煮，不要像孫猴子入丹爐，捏着「避火訣」，在這裏烈火紅紅，他那裏清風習習。這是「躲風」；離開陣地是「躲」，在陣地裏也可以躲。煮過了，並不就算「熟」，還得長時期的熬鍊，一直到要「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不免胡謔幾句：

鑒火煮來慢火蒸，
煮熟都要工夫深。
不要捏着避火訣，
學孫悟空上蒸籠。
西餐牛排也不好，
外面焦了內夾生。
煮是暫令煮要久，
純青爐火十二分。

(註)讀先生詩原有五首，茲將其他三首亦附錄在下邊，以供參考：

毛主席告誡同志必須實事求是不可譁衆耍寵偶成四句以
伸其義

不求一時亂拍手，
不求一時多鼓掌，

要使將來暗點頭；
要求將來少搖頭。

行知合一——王陽明知行合一，今以唯物觀，不如改爲
行知合一。

行內有知知行行，
吾人要辦當今事，

歷史都是古人行。
滲入民間去實行。

讀馬列辯證法有感

守株待兔太艱辛，
削足適履真傻漢，

緣木求魚不可能；
刻舟求劍是愚人。

（第一個然性認爲必然性，第二不可能認爲可能，第三外式主觀，不會用當胸轉料，第四動的宇宙認爲靜的宇宙。）

「此心光光地」

錦亭先生

「王陽明臨死時，說：『此心光光地』。光光地，不易做到。」

有歪的念頭，俗話叫「心上生毛」，有毛即是不光光。某小說上載：人死時，心最難死，一生的好事壞事，都要來心上重演一次，遇好事，清涼愉快，遇壞事，痛苦難堪，更壞的事，就好像上刀山、下油鍋一樣。我沒有死過，不知道這話的真實在如何；但可信的，我們活着的時候，如果沒有任何私心，沒有做過虧心事，「無事不可對人言」，那就如少奇同志說的：「他可能最誠懇、坦白與愉快」；遇到需要犧牲的時候，他也能愉快地視死如歸，「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原因就是他的心上沒有毛。

「此心光光地」，可以有三種：一種是社會上的好人，不損人利己，不陰謀詭計，「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门心不驚」。一種是有修養的人，如王陽明先生之類，「居敬守靜」，不使一點「物欲」擾及他的心靈，最好的做到了「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另外一種就是最革命的人如我們共產黨員。第一種是自在的，可以說「光光」，也不一定「光光」；第二種，不滿意現象，却無力改造現象；常能夠保持心地高尚、純潔，算是偉大，然而不免落於空虛。只有第一種最革命的人，他有清楚而堅定的階級的革命立場，沒有任何個人的顧慮和私慾；而這些又恰恰是指導他去對於真理的理解與事物的觀察，即是說：指導他極可靠的實踐。「這就是我們的道德之所以最偉大、最科學」。最科學，是第一二種人沒有的；因此，他的修養比第一二種人要偉大得多；第一二種人所謂「光光地」，在我們看來也許還有不少要拔去的毛。因此，他不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而且能有無窮的興味，最高的愉快。

整風——思想革命，無產階級의思想和侵蝕到我們黨內的小生產者，剝削階級的思

想做鬥爭。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是毛的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宗派主義」，「打壓別人，抬高自己」，「誇誇其談，譁衆取寵」……等，是毛的現象。必須把這些心上的毛，連根拔掉。

嘴上的毛，天天刮，天天生，拔去，也還生，可見要「光光」不是件易事，有的同志，護着毛不肯拔，說沒有毛。其實共產黨員來自社會的各部分，仍生活在現在社會中，帶來現在社會一些不乾淨的東西，並不是怪。比如我讀少奇同志的共產黨員的修養裏所指的錯誤意識，有些我沒有的，有些有過甚至現在還有；有些曾發展過，有些只是二點根子。這些東西，與其護着使長在心裏作隱痛，不如一下去掉爲好。又有的同志說我離犯過錯誤，但我的動機是好的，我心上沒什麼毛，照閻王殿裏「無心爲惡惡不罰」的例，是可以原諒的。但這在紀律上說，可以，在修養上說，不可以。沒有惡根，不應有惡果，你自以爲站穩了無產階級的立場，實則小資產階級思想天天在你身上作祟。自己以爲沒有，其實是有；自己以爲沒有，無異拒絕反省，而「毛」就在這掩蓋下滋長起來，影响着你的內心作痛。還有，沒做過多工作的青年同志，沒有跡象可省，也比較難得去省。但若以爲就無可省，那無異說心本是光光地，因爲做工作才長起毛來。要知道缺乏實際鍛鍊的人，毛病更多，原因就是沒有經過鍛鍊，他更應該深思熟慮，了解不良意識的社會來源，學習黨的優良經驗，把心腔裏的惡濁東西，不待牠發作就把它去掉或堵塞起來。此時修養多做一份，將來工作效果也就增加一分。最後我不贊成小說上「人的善惡，死時都要在心頭重演一次」的說法，這是算舊賬。人無論有何罪過，一經改革，就應同沒有罪過一樣。我們參加革命前，也許反對過革命；參加革命時，也許動機

不純；參加革命後，也許發生過動搖或錯誤，這都沒有關係。「雲過天青」；「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而所謂今日昨日，又並非指一定的日子，今天改正了昨天的錯誤，明天又改正今天的錯，天天在進步，天天有新生。人生的行程是直線的，不是平列的，所以不僅對別人不應算舊賬，對自己也用不着以曾經有過惡濁東西爲羞。至於我們定要把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惡濁東西去掉，不只是爲着心裏好過，而是爲着能夠負擔起改造社會和人類的偉大任務，沒有自覺的（不是自在的）無產階級意識，反映到無產階級先進的份子——共產黨員的腦袋裏，他就不能夠正確地理解真理與觀察事物，不能夠堅持長久而艱苦的鬥爭，即是不能指導偉大的人類解放鬥爭的勝利。老話說：「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你無私，你就會更學得好，聰明能力，自然增長，也正如少奇同志說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前進心，與個人主義的前進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追求真理，擁護真理，並最有效的爲真理而鬥爭，它有無限的發展前途和進步性。而後者即對個人來說，它的進步性也極有限度，並且是沒有前途的，因爲後者常常因個人利益而自覺地抹殺掩蓋其歪曲真理。」

口頭與書面

常同商談用口，隔地商量用筆。筆下寫的要和口裏講的一樣，也即是和心裏想的一

標。這樣的書信（或報告）才有效用，才能解決問題。

常常有這樣的情形：當面談可以發現很多工作經驗，可以提出許多亟待解決的困難問題；然而在書面報告上常常看不出來。當面談的機會不多，平常還是書面，這樣會使上下隔膜，妨礙工作。

何以這樣？大概是：有些負責同志文化程度不高，談得出，寫不出；寫的是另一人，不大知道工作的深刻處，把報告看成官樣文章，照例一項項寫去，照例有優點有缺點，却不必研究優點缺點的原因所在。這都是不好的。應該把報告看做和當面談一樣，生怕對方有不明瞭處。不會寫的，要把講的話告訴秘書，要他照着寫，寫好要聽他唸，看有遺漏和不明白的地方沒有？同時執筆的同志要學習寫，不是能寫就完事，而是要寫的和說話一樣，使對方看了就洞悉一切。舊式的不着痕迹的公文，我們在工作上一點也用不着。

認得還要解得

不管文字怎樣通俗，寫的總並不就是講的——言文未能一致。

在方塊字沒變成拼音字以前，認得並不等於解得，有些同志認字頗多，還不能算有文化。舉個例子。

三月二十二日本報第四版媚邊閒話末欄：

『說：「我種了菠菜，你將來來摘吃罷！」英雄，我佩服他。』

原稿是：

『……「我種了菠菜你將來來摘吃罷！」』

趙樹德同志是個英雄，我佩服他。』

「趙樹德同志……」是提行的。排字同志眼睛跳了行，把後行的「英雄」，接了前行的「吃罷」；校對同志跟着跳了行，不及校正。然文章是解不得了。

四月二十九日本報第二版一得書末欄：

『並不是每個讀者都有過或見到過，因而定要「會亦云」』。

原稿是：『並不是每個讀者都有過或見到過，因而定要「人云亦云」』。排字同志把人云兩字當做簡寫的「會」字，校對同志也未能校正，於是「會亦云」就莫明其妙了。

這並怪不得排字和校對的同志，因為認得和解得，本還有相當距離。

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上說：「……不應只限於認字之多少，而是包含閱讀寫作能力……」。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上說：「……以該機關某一文化較高的幹部減少其日常工作使他兼任教員，亦可專用教員……」。這是說，我們工作人員，僅僅認得字不夠，要能閱讀或者寫作；而各機關文化高的同志，就負有教他們的責任。

認得和解得雖有距離，但距離很近，只要一經指點，就可以一通百通。各機關應該有一專負責任的文化較高同志，專門檢查文書校對的錯字錯句，同他們解釋，這個工作

雖然繁瑣，但一二個字的指摘，常常比上幾堂文化課收效要多。

這裏又應該學習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常常到文書科去檢查，對於重要文件，一定自己校板，並常向文書同志解釋某字某筆的錯。

對於寫鋼板的、油印的、校對工作的同志，應當尊敬他們，愛護他們，具體地幫助他們改善工作。

關於寫字

前辦報時，早晨看報，總用手用紅筆把錯字錯句錯標點標出，送給校對同志注意。總到自己以為有意義的文句，而因為校對不好，使看的不易明瞭，心裏總有點不舒服。不免寫幾個責備校對者的字在上面。

後見毛澤東同志凡重要文件，總親自校正臘版；印出的頭一張須送看，不清楚，必得重寫。有一次，起草一個指示，內有「出佈告不得寫草字。」毛澤東同志的心細，真是非常人所及。

然而有些人常常忽視這一點。

領導機關，以為文件發了就完事。起草的同志也以爲起草完了就完事，不知道文件送到看的人面前，要通過謄寫或印刷的「關」，此「關」交代不清，可以使一切心力都

最口說。

常見有油印文件，等於「鬼畫符」，居然也發出了。人家不是鬼，怎麼看得懂鬼畫的符？然而我們又責備人家不應該把文件「打折扣」。

寫文、印報，目的是要人看且看得懂，所以定要檢查，定要清清楚楚，沒有說錯。

說話的音調不清，可以立時反問，重來一句；代表音調的符號——字——不清，就不免使人爲難。然而我們寫信寫報告或者抄寫，常常似乎另有一決心，一個決心是不要人看，第二個決心是自己也不想再看。證據是人家看不懂時去找他本人，他本人也很容易吃出。

草字本不易認，何況還是「獨家草」，人家不通用的。這樣的文件：短，勉強猜猜；長，只好擱下，如其中有什麼重要事件被抹殺，那是「活該」。

爲着使人家容易看，寫信寫報告或者抄寫，定要清清楚楚，行字也不要太密。

還有，簡筆字是值得提倡的。不過，也要看它流通的範圍。如果把：「圖」、「圖」、「干」等字，寫給邊區以外或沒有看過的人，那他將莫明其妙。

所以正式的公文書信，最好不寫簡筆字。

要檢查油印，要寫得清楚，費工夫是要多一點，但是值得的。可以減少看的人的工夫，且易使文件發生作用。

要注意寫是爲着看，且是爲着識字不多的人看。

一得書

——元九價生——

著者：煥南

出版者：新華書店

發行者：新華書店

(一—三五〇〇)

一九四五年九月

TO
978340